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美】卡伦·霍妮◎著 辛怡◎译

对现代人的病态心理
和变态人格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向自己的内心坦白，终有一日你会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自我疗伤、自我修复，化解焦虑、孤独、自卑的良药。

我们时代的 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美】卡伦·霍妮◎著 辛怡◎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 (美) 卡伦·霍妮著；辛怡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113-7212-3

I. ①我… II. ①卡… ②辛… III. ①病态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983 号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著 者 / (美) 卡伦·霍妮著

译 者 / 辛 怡

策划编辑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高文喆 王 羽

责任校对 / 志 刚

封面设计 / 胡椒设计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9 字数 / 163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7212-3

定 价 / 3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序

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进行精准地刻画，也是为了对他们内心的矛盾、焦虑、痛苦和他们在人际交往及个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阻碍进行精准地刻画。我无意于在这本书中对任何一种类型的神经症进行探讨，而只是想对存在于我们时代中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人以不同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性格方面的共性进行探讨。

存在于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及神经症病人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所做的尝试，现实生活中神经症病人的焦虑和他们在与焦虑的对抗过程中所构建的防御机制，是我重点关注的内容。但关注现实处境，并不代表我对从本质上来说神经症都形成于幼年这一观点的否定。不过不同于其他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是，我对将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童年并不赞同，对视病人的后期反应

为早期经验本质上的再演绎也不赞同。我想要说明的是：病人的童年经历与后期矛盾之间的关系远比普通精神分析学家所做的假设复杂。这些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专家们所关注的因果一般都极为简单，但事实上：虽然童年的经历是神经症病发的决定性条件，但病人后期所产生的种种心理方面的障碍却并非全都是因它而生。

当我们将现实的精神障碍视为关注焦点时，不难发现：神经症的病发不单单缘于个人的偶然经历，还缘于我们身处的与众不同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文化环境不但能为个人经验增色，还对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说，一个人的母亲是极富牺牲精神还是颇为独裁，这都源于命运，可无论是独裁还是极富牺牲精神，都是文化环境特定时才会出现在母亲身上的特征。同样地，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环境的存在，这个人日后的生命才会被这类经验所影响。

在我们对文化环境给神经症造成重大影响有了充分的认知以后，生物与生理因素立马就会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在神经症领域中，再不会如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被认为是神经症的根源。而且唯有以大量的、精准的事实为依据，这些次要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才会被重新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以这种思想倾向为基础，我们重新对存在于神经症领域的众多基本问题做了诠释。虽然在诠释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被涉及（譬如受虐倾向、病态的爱之内涵、犯罪的病态感等），但它们所具有的基础却是相同的，也就是在病态性格倾向的产生过程中，焦虑起到的作用极具决定性。

因为我所做的诠释有很多都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部分读者或许会对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分析产生疑问，而是与不是则取决于你所认同的精神分析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假如在你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才是精神分析的整体根基，那么，我在此谈及的所有便与精神分析无干。但假如在你看来精神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种对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及表现形式进行考察，并将其意识化为一种心理治疗形式的基础思路，那么，我在此谈及的一切就都隶属于精神分析的范畴。在我看来，将思想局限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在神经症领域中的所有发现很有可能便全都是弗洛伊德希望我们从他的理论之中发现的。这是一种食古不化的顽固。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巩固才是对他伟大成就的最大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携手实现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才能实现精神分析领域理论与治疗的双重实践。

与此同时，另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疑问，即我的思想是不是

与阿德勒^①理论类似，也得到了答案。的确，我的思想中有一部分与阿德勒过去所强调的观点类似，但从本质上讲，弗洛伊德理论才是我的思想构建的基础。实际上，最好的证明恰恰是阿德勒的理论，它表明：如果探索的方向是片面的，如果不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基础，哪怕是极富创新性的心理洞察也将索然无味。

因为本书并不是以界定我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异同为主要目的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所做的争辩多集中在我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存在极大分歧的问题上。

我在此谈及的一切，都是在对神经症漫长的分析过程中，我所斩获的各种印象。若需要对我构建自身理论所依据的事实进行阐述，我就必须在本书中对诸多具体的病例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对于一本以对神经症进行概括性介绍为主旨的书籍而言无疑是冗长且不当的。并且，就算这些材料没被提供，无论是行内精英还是外行者也都能对我的理论正确性进行检视。如果他擅长观察，他便能用他的经验、观察结果与我的设想相对照，并以此为根据，或认同或否定或修正或支持我所阐述的

^①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心理学家，创立了个体心理学派。他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是：“个人行为是不是具有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责任性，在工作中与他人有怎样的联系，以及是否能够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原注

一切。

本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并未过多地关注细枝末节；在文中，我也很少使用那些常能导致人无法理性思考的技术性术语。所以，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外行人，大概会认为神经症人格这一问题原本就浅显易懂，但这一结论明显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我得承认，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繁杂与微妙的。若有人不愿认同这一事实，那么他完全没必要阅读本书，否则他会更加迷糊，还会因为无法寻觅到现成的公式而失望至极。

本书不仅是写给那些对神经症饶有兴趣的外行人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和神经症患者因职业原因有过一些接触，因而对书中所述的各种问题颇为熟悉的内行人看的。这部分人既有神经症方面的专家、社会工作者，也有教师及部分已经意识到心理因素在文化研究领域意义之重大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另外，我希望神经症病人本身也能因本书而有所收获。若从原则的角度上来讲，神经症病人并不视心理学为对其个人的一种侵犯而排斥的话，他便常能以自身的苦痛为根据，更敏锐、更深入地了解人心的复杂与多变，这些，是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无法做到的。但是很遗憾，他无法通过阅读而治愈疾病，也无法通过阅读而从自身的处境之中摆脱出来；通过阅读，他看得最多的多半都不是自己的影子，而是他人的影子。

我希望能借此表达我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由衷感激，托德女士是本书的编辑。在本书的正文中，我也提到了部分作家，我也必须要向他们致以谢意。但我最想要感谢的还是给我的工作以根基与工具的弗洛伊德先生，与此同时，我还要将谢意送给我的病人，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正是源于我们之间的协作。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 001
第二章 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原因 / 019
第三章 焦虑 / 031
第四章 焦虑和敌意 / 051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 071
第六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 / 093
第七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续） / 107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性 / 127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神经症需求中扮演的角色 / 139

第十章 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 / 153

第十一章 神经性竞争 / 177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 195

第十三章 神经性罪恶感 / 219

第十四章 神经性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 247

第十五章 文化和神经症 / 269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现在，对我们而言，“神经症”已经是一个运用相当随意的词汇了，但对我们它的含义却常缺乏一个明晰的认知。一般说来，我们使用它不过是为了以一种博学的形式来炫耀自己，来表达自己对某种行为的不认可罢了。如果我们曾习惯性地用懒惰、多疑、敏感或贪婪来形容某个人，那么今天我们也许会直白地用“神经症”来形容他。即便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词的精准定义，可在使用它的時候，我们依旧是有所指的。在决定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已无意识地运用了某些对象选择方面的标准。

首先，在对待事物方面，神经症患者的反应总是有异于他人。如果有一个女孩，她心甘情愿身居底层、没有上进心、不愿得到更多的薪水，也不愿意和领导保持一致，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她当成神经病。又譬如有一位艺术家，只要他愿意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创作，他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但他的周收入却只有 30 块，因为他更愿意依靠这微薄的薪资去畅享人生；他要么把大把的时间用于混迹女人群，要么沉溺于某些毫无意义的嗜好或者小的技艺中。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也会被我们当作神经病，原因就在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其实只有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给我们以鼓励，鼓励我们赶超其他人，鼓励我们将世界征服，鼓励我们去获得远多于生存基本所需的钱财。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判定某人是否为神经病所凭借

的标准，是观察其生活方式，看他是否与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生活模式相符合。如果这位不愿意参与竞争（或者说最起码竞争意识并不显著）的女孩身处受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影响的地域，那她就是一个极正常的人；同理，如果这位艺术家身处墨西哥，或者某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村落，那他肯定也与常人无异。原因就在于，在这些地方，人们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在满足某些必要的、直接的需求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获得更多的金钱，无论是谁。如果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满足个人所需之后仍竭力工作的态度，在古希腊曾被视为卑贱，这毋庸置疑。

所以尽管神经症之说来源于医学，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却必然有其文化内涵。在对患者身处的文化环境没有任何认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为他骨折的腿进行诊断，但如果我们将一个深信自己出现了各种幻觉的印第安少年^①是神经病，其中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因为依照经验，幻象与幻觉在印第安人与众不同的文化中一直都被视为神的恩赐，是天资异禀的表现。天赋与众不同的人会被郑重地赋予某些特权，并享有一定的威望。如果某个以我们的文化为背景的人宣称他和他已然

^① 见斯卡德尔·梅基尔《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935年第三十卷第292—300页。——原注

逝去的祖父曾有过一次长谈，他肯定会被当作精神病人或者神经病。可是这种和先辈交谈的行为模式在部分印第安部落中却是常态。如果某个以我们的文化为背景的人在已逝亲人的名讳被提及时愤怒不已，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可是如果他身处基卡里拉·阿巴切^①文化中，那他的行为就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某个身处我们的文化背景下的男士因与某位处于经期的女士接近而惶恐，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但对月经的畏惧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却是一种惯性的常态。

因为文化不同，人们对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也不同，并且即便是相同的文化，伴随着时光荏苒，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如果一位独立且成熟的现代女性仅仅因为已经与他人发生过性行为就承认自身是堕落的，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得到高贵者的爱恋，那她肯定会被当成疑似神经病者，最起码在当下社会的很多阶层中是这样。但这种负罪感在四十年前却被认为毫无益处。因为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人们对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也会有所差异。举个例子，在封建社会中，男性终日无所事事，仅在战争与狩猎时一展身手原本就是一种常态；但在小资产阶级社会，这样的行为会被认为极端地不正常。因为性别不同，

^① 见奥普勒尔《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杂志，1936年第七卷第82—116页。——原注

对正常与否的认知也会出现差异。男女气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是一种共识。快四十岁的女性对衰老充满恐惧也没什么不对；但这个年纪的男性如果因此而愁苦不已却会被当成神经病。

所有受教育者多多少少都明白，我们常说的正常其实包含着种种不同的情形与变化。我们很清楚，从饮食习惯上来讲，中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我们很清楚，从清洁的角度来说，爱斯基摩人与我们差距巨大；我们很清楚，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土著巫医与现代医生所使用的方法也大相径庭。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人类之间的差异不但存在于风俗习惯上，还存在于欲望情感中。人类学家们对这一点曾做出过直接或间接的指正。^① 正如萨皮尔^②所言，对“正常人”的内涵无止境的发掘原本就是现代人类学学者的一份功绩。

所有的文化都有理由为这样一种观念执着，那就是确信在“人性”领域中，唯有自身所表现出的欲望与情感才是正常的。^③ 心理学也是这样。举个例子，经过观察，弗洛伊德认为相比男性，女性更善妒，之后他便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为这种

① 见人类学资料方面的杰出著述，见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社会的性事与气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和哈洛威尔即将问世的《人种学工作者心理学手册》。——原注

② 见爱德华·萨皮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1932年第二十七卷第229—242页。——原注

③ 见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原注

完全出于他假想的一般现象寻找依据。^① 甚至，弗洛伊德还做过每一个人都曾有过谋杀类负罪感的假设。^②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杀人这件事，不同的人观点肯定迥异。正如彼得·弗罗伊琴所说的那样，^③ 在爱斯基摩人看来，杀人犯不一定就要被惩戒。外来杀人者用某种代价来抵偿杀害某个家庭的成员而给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的事情，在很多原始部落都发生过。在部分文化环境里，悲伤欲绝的母亲完全可以收养杀害儿子的

①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论文《两性间生理解剖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必然会让所有女孩子都对男孩子具有的阴茎产生羡慕之情。后来，她那个想要拥有阴茎的愿望就转化成了想要拥有一个具有阴茎的男人。此时，她开始忌妒别的女人和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像一开始忌妒阴茎一样忌妒别的女人拥有的男人。弗洛伊德在提出这样的主张时，迫于当时的压力，概括性地诊断了所有人类的人性。不过，他的这种概括的基础只是他对某一文化区域进行的观察。

人类学家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观察的准确性，却只会同意把这种观察看成对某一时代某一文化中的一些人的观察。不过，他们对弗洛伊德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他们会主张，在对待忌妒的态度上，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一些民族中，男人的忌妒心超过女人。还有一些民族中，男人和女人都非常善于忌妒。由于这些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他们会反对弗洛伊德（其实是反对任何人）以性别的解剖学差异为基础展开观察。相反，他们主张要考察生活环境的差异和这些差异对男女的忌妒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虽然弗洛伊德的观察切合我们时代的女性神经病人的实际情况，但是对于同一文化中的正常女性，它是否适用呢？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着正常人越来越被终日和神经病人接触的精神分析专家忽视这一事实。我们还要问，是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产生了忌妒心和占有欲？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的文化中有怎样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是如何让忌妒心产生差异的？——原注

② 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原注

③ 见彼得·弗罗伊琴《北极探险记与爱斯基摩人》。——原注